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现代文化新视角”丛书



丝路文化新聚焦



梁
超
主
编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现代文化新视角”丛书

丝路文化新聚焦

梁超 主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641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总 序

继全国对口援疆会议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之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新疆工作的总体部署和长远规划，2010年5月，自治区党委在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具体战略规划：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打造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增长极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美好新疆。这些重要决策和部署，为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为新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凸显了文化建设在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现代文化新视角”丛书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战略环境下孕育和催生的。

“现代文化新视角”丛书所收文章均出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创刊二十多年来，沐浴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新疆师范大学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始终把推动科学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以“推进优势学科、凸显民族特色、形成区域风格、参与资政建设”为理念，以“出力作、创名栏、塑品牌，打造期刊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提升学报整体质量为生命，以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阵地为己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突出创造性，不断推动学报文化引领的进程，全面提高学报的主导意识和资政水平，努力使学报成为为自治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服务的较高水平的理论平台，成为自治区乃至



国家中亚问题研究理论创新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实现了学报又好又快的发展。新疆师范大学的汉文社会科学报连续多次被评为“全国百强学报”、“全国民族地区十佳学报”、“新疆期刊奖获奖期刊”，并跻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报核心期刊”行列。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现代文化新视角”丛书，从大文化范畴着眼，以现代文化为新的视点和突破口，以解决新疆及中亚最急迫、最紧要的现实问题为诉求，力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节点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服务于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力推动现代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发挥现代文化兴疆、强疆、富疆、稳疆的重要作用，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向各族读者奉献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努力做好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篇大文章。

“现代文化新视角”丛书主要汇集了学报近几年来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显示度的成果，熔铸了国内外作者群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是新疆师范大学实施品牌战略和“十二五”科研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实行开放办刊和精品战略的主要成果。今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要继续发挥好自身特点和优势，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解决新疆及中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准确把握自治区大开发、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脉搏和各族读者的新期待、新需求，抢抓机遇，突出主题意识和策划意识，编辑出版更多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理论性和针对性的精品力作，把蕴涵在先进文化中的精神力量，真正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族群众的生活工作中，为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新的贡献，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现代文化新视角”丛书主编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梁超

2011年5月18日



目 录

岁月钩沉：把握文化新脉动

- 佛教传入龟兹时间考 霍旭初 / 3
- 前秦与西域东部关系考 李 方 / 21
- 龟兹学与国学 柴剑虹 / 33
- 论“索国”与突厥部的起源 温玉成 / 38
- 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程喜霖等 / 46
- 近百年来的高昌政治史研究概况 施新荣 / 77
- 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遗物与新疆于阗佛教关系考 贾应逸 / 90
- 试论新疆地区的密教信仰
——以千手观音图像为例 李 翎 / 110
- 新发现的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相关问题解析 王 征 / 130
- 图理琛西使动因小议 杨富学 / 147
- 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评 朱玉麒 / 155

采珠撷玉：挖掘地域新宝藏

国法与乡法

- 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 孟宪实 / 169

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

- 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一 王 素 / 186




- 《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补正 侯 灿 / 199
- 《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 余太山 / 206
- 唐诗“交河”语汇考论 盖金伟 / 218
- 回鹘文《大白莲社经》一叶残卷研究 耿世民 / 233
- 塔里木盆地“沙埋古城”的两则史料辨析 田卫疆 / 239

瑰丽苍凉：诗意人生新感怀

- 高适、岑参与盛唐边塞诗的人性内涵 薛天纬 / 253
- 伊犁将军西域诗论 星 汉 / 268
- 以战求和：唐代边塞诗的主旋律 董恩林 / 296
- 延客与感君
——兼谈唐诗中胡姬的形象塑造 蒙 曼 / 305
- 论葛逻禄诗人迺贤的丝绸之路诗歌 宋晓云 / 316
- 清代西域风情诗三论 吴华峰 周燕玲 / 325

异彩纷呈：感知艺术新韵律

- 西域石窟壁画中的图案艺术 周菁葆 / 337
- 论新疆传统地毯的传承保护与创新 董馥伊 / 360
- 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绢罽研究 王 博 王明芳 / 376
- 论新疆传统织毯图案的艺术特征与价值 董馥伊 / 391
- 汗都春与曲子剧比较研究 肖学俊 韩芸霞 / 402
- 中国新疆塔塔尔族民歌之存现及其原因探析 崔 斌 王建朝 / 425



**岁月钩沉：
把握文化新脉动**

佛教传入龟兹时间考

霍旭初*

摘要：佛教传入龟兹时间问题，久而未决。文章拟通过中外学者已经发表的观点，并利用已有的新旧材料，开拓思路，从文献记载、文物遗存入手，发掘更深的内涵与背景，对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问题作一些考析。经过考析，综合各方学者的意见和观点，得出一些新的概括认识。

关键词：佛教 龟兹 传入时间

佛教传入龟兹时间问题，与佛教传入西域、传入中国内地时间和路线问题紧密相关。它影响到中国佛教史、新疆宗教史、龟兹石窟年代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探讨。虽然对此问题的探索已有时日，成果也不少，但至今仍有些不够明朗，是学术界久而未决的难题。以往的研究，有的拘泥于文献记载，有的沿袭前贤旧说，有的观点前后抵牾。实际上，此问题还有许多可以拓展的探索空间。本文想利用已有的新旧材料和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开拓思路，就此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佛教向印度本土以外传播，始于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阿育王进行第三次佛教结集后，就派遣上座向四方传法。到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但普及印度全境，而且西到地中海东岸，北到克什米尔，南到斯里

* 霍旭初，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



兰卡及东南亚。此后，以罽宾（克什米尔）为中心，继续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和葱岭以东中国西域和中原地区传播。这条传播路线被称之为“北传佛教”路线。

佛教由罽宾向东越过葱岭，于公元前1世纪，首先传入中国西域的于阗。于阗成为西域最早接受佛教的地区，也是佛教继续东传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问题，有资料可考，已有定论，这里不作详论。但于阗北面近邻的龟兹，何时传入佛教，却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远没有佛教传入于阗那样清楚。由于龟兹地处沟通欧亚大陆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北道的中枢地带，佛教何时传入龟兹涉及丝路北道诸地佛教的传入问题，又与佛教何时、通过何条路线传入中国内地关联着。因此，探讨佛教传入龟兹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之一。

关于佛教传入龟兹的具体时间，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直接可资证明的材料。中外学者所发表的观点多为一种概括论述。中外学者关于佛教传入西域和龟兹的时间与路线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学者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说：

盖在西汉文景帝时，佛法早已盛行于印度西北。其教继向中亚传播，自意中事。佛法来华，先经西域。在汉代，我国佛教渊源，首称大月氏、安息与康居三国。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然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①

2.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说：

佛教传入西域，时间要比内地早，但早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最迟也不会晚于一世纪，因为佛学传入中国是在二世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第33、57、59页。

纪中叶，传入内地之前，还应当有个时期在西域流通。^①

3.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说：

新疆何时始有佛教，现尚无确定说法。就我们所见，两汉遗址，例如轮台湖滩中之西汉旧城，不见有庙宇，沙雅西北沙碛中如大望库木、额济勒克一带之东汉遗址，亦不见有庙宇，由是言之，新疆佛教当起于东汉末季。^②

4. 季羨林《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道路和时间》说：

佛教传入龟兹，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早于传入中国内地。公元前某一个时期佛教传入龟兹，从地理条件上来看，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重镇，处于天竺与中国之间。佛教先传入龟兹，完全是顺理成章的。^③

5.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说：

佛教由西北陆路传来之传统旧说仍不可易，汤用彤先生详为论证，肯定其事，是也。^④

6.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说：

龟兹佛教传入的年代和于阗差不多，总在公元二世纪中，它可能是通过它的西邻疏勒传入的。^⑤

①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第39、40页。

②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第3页。

③ 季羨林：《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道路和时间》，《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第227页。

④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5，第1页。

⑤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238页。



7. 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说：

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为公元二世纪上半叶班勇离开西域之后，在这之前民间可能通过商贾带进一些佛教艺术品，葱岭以西的佛教徒亦可能零星地随商旅进入塔里木盆地，但未流行传开、也未造成影响。^①

8. 宋肃瀛《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初传》说：

佛教在新疆的始传，不会早于公元二世纪下半叶。^②

9. 荣新江《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说：

我认为佛教从西北印度大月氏（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经陆路传入汉代中国的说法最为合理。^③

10. 温玉成《佛教传入路线及早期佛教图像问题》说：

传统的丝绸之路就是佛教初传中国的道路。^④

（二）国外学者

1. 日本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说：

佛教流行西域始于何时？……在我看来，从文明传播的原则论，

① 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第71页。
 ② 宋肃瀛：《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初传》，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第423页。
 ③ 荣新江：《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载《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43页。
 ④ 温玉成：《佛教传入路线及早期佛教图像问题》，载《中国佛教与考古》，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第71页。

必在中国始传佛教之先，西域已经流行佛教。^①

羽田亨在另一著作《西域文化史》中进一步说：

至于佛教何时起流行于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尚无确证。但从3世纪中期有龟兹人白延来魏从事佛典的汉译工作，北魏朱士行到于阗求大乘佛典以及汉译最古佛典中有龟兹语音译或义译的词来看，应在这些汉译佛典之前，即公元2世纪以前那里就已经流行佛教了。^②

2. 日本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说：

从地理上之关系而论，佛教之传入龟兹，必较中国为早，殆为当然之理。故佛教传入龟兹之时期，必与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即汉明帝时或同时或在先也。^③

3. 英国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说：

目前还不能肯定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和通常称之为中亚细亚的其它地区的确切年代。但是大约在基督纪元之时，它必然已经盛行于该地，因为佛教从那里传入中国不晚于公元一世纪中叶。^④

4. 日本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说：

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几乎都是从西域地方的陆路而来，到了东晋、南北朝以后，经由南海航路者逐渐增加。^⑤

①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16页。

② [日]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138页。

③ [日]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84页。

④ [英]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7页。

⑤ [日]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关世谦译，佛光出版社，1985，第77页。



以上诸家对于佛教传入西域和龟兹时间的论述，多是以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先必然经过西域为前提的推论。可能限于史料的原因，故而都没有举出比较直接的材料来论证。

国外与我国有的学者在研究佛教传入龟兹问题时，使用了《梁书·刘之遴传》的一条记载：“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澡灌”是佛教洗涤用具，元封二年是汉武帝年号，即公元前109年，故有人认为公元前佛教已传入龟兹。同时举《出三藏记集》中《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记序》一段“大法流此（龟兹）五百余年”来印证。^①但有学者对《梁书·刘之遴传》所载表示怀疑，提出了几方面的质疑。主要认为当时龟兹依附匈奴，西域与中原交通阻塞，不存在龟兹朝贡汉朝的可能性。此外，对“大法流此五百年”之说，也认为是后人炫耀佛法长久的心理表述，不足为史凭。^②

从上述诸家观点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问题都是与佛教向中国内地传播路线问题一起审视的。他们的共同点是：中国内地佛教是通过西域传来的，因此，西域佛教的传入必然要早于内地。持这种观点者，主要从印度向外传播的“北传佛教”路线的走向，印度西北部佛教中心罽宾的地理位置，贵霜王朝的推动，两汉安息、月氏、康居译僧来华及“丝绸之路”的开通等方面，认为中国佛教首先是从陆路传入。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汤用彤先生。他的“佛法来华，先经西域……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然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等论说，代表了主张佛教最早由西域陆路传入中国内地的基本观点。

季羨林先生从语言学角度论述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问题。他对“浮屠”一词的来源进行考证，指出“浮屠”不是来自印度本土的 Buddhho，而是来自大夏语，以后又有吐火罗语。季先生将佛教传播路线分为两个阶段，并归纳为一个公式：

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① 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西域研究》1990年第2期。

② 薛宗正：《佛教初传龟兹新考》，载《龟兹学研究》第2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

buddha→bobo, boddo, boudo→浮屠

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①

季先生另辟蹊径的论述，对佛教经西域陆路传入中国内地，提供了有力的语言学的支撑。

但是，迄今为止，在新疆范围内尚未发现属于汉代的佛教遗迹，并且《汉书》与《后汉书》没有西域佛教的记载，从而形成了北传佛教路线上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空白。这就成为佛教是从海路传入之说的重要理由之一，陆路传播之说受到了挑战。^②

主张佛教先从海路传入中国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先生，他在《佛教之初输入》中基本否定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诸传说，也否定佛教先经陆路的观点。他说：

今当研究佛教初输之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此后百数十年，粤淮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播蒔于楚乡。^③

近年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和内地汉代一些佛教造像的辩论比较活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与新疆佛教遗迹的年代问题紧密关联的。关于佛教传入中国路线问题的论争，已有很大进展与收获，“陆路”传统观点得到有力的支持和维护，这对探讨佛教传入龟兹时间与路线等问题，大有裨益。^④

① 季羨林：《再谈“浮屠”与“佛”》，载《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6，第109页。

② 荣新江：《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载《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③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载《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第25、26页。

④ 荣新江：《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载《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温玉成：《“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质疑》，载《中国佛教与考古》，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二

佛教传入龟兹时间问题实际上是佛教传播方式与传播条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比较深入探讨的是荷兰学者许理和（E. Zürcher），他首先根据汉代中国佛教的具体情况认为：

汉代佛教是一个综合现象，它至少由三个非常明确的部分组成。其一，以宫廷为中心的混合崇拜；其二，以最初的僧伽为核心的规范化佛教；其三，中国本土的信仰和宗教崇拜对佛教因素广泛和盲目地吸收。^①

许理和的论点实际就是佛教传播的条件问题。他认为佛教传播首要条件是：僧伽是佛教传播的核心因素，没有这个核心，佛教就失去社会基础。佛教的传播实际上就是僧团——寺院在传播，而一个僧团必然要有一个供养僧团生活的根据地。许理和说：

它或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或是一个大城市，或是一个商镇。总之是富户多的地方。那些富户一旦皈依佛教，便成为“施主”（dānapati），即支持僧伽的善男信女。这种创立新僧团的活动不断地、机械地、盲目地重复无数次，成为推动佛教僧院组织扩张的动力。^②

许理和还指出，僧团在经济上是寄生的，因而，大寺院只有在城市才能实现，必须有城市做基础。许理和将以上佛教传播条件归纳为三个特点：接触传播、保护人（皇家供养人）和城市背景。

根据考古发现，公元1~2世纪间，佛教从西北印度阿富汗东部发展到北面的巴克特里亚和粟特地区。那里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发达地区，已

① [荷] 许理和：《汉代佛教与西域》，吴虚领译，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2辑，大象出版社，1998，第292页。

② [荷] 许理和：《汉代佛教与西域》，吴虚领译，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2辑，大象出版社，1998，第300页。

经有大的中心城市。在这里发现许多早期佛教寺院遗址，其中最早的为公元2世纪初。但是，在同一时期的塔里木盆地，却没有发现佛教遗迹。

今天的新疆，虽然在当时充当了佛教传播的通道，但是很明显，那里的绿洲没有那么早就建立起佛教。^①

塔里木盆地最早的佛教艺术品发现于和田与鄯善。但时代没有早于公元3世纪的。这就是说，公元1~2世纪，在整个塔里木盆地还没有形成大的中心城市，还不具备佛教传播的社会基础条件。

佛教文献与遗迹都表明，公元3世纪，西域佛教已比较兴盛。但1~2世纪的佛教资料非常匮乏，对这个时期佛教“空白”的原因，长期以来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许理和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他用《汉书》与《后汉书》西域人口的记载对比，举出古代新疆9个绿洲国家，出现了人口爆炸，百年间居民数量平均增长了5倍^②。许理和说：

中国式的密集灌溉农业通过中国军事屯田传到中亚。……由原始农业向高度发达的绿洲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屯田制度起了刺激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我们通过比较《汉书》和《后汉书》的人口数据而作出的判断如果成立，那么，下一个推论就是：屯田——人口增长的整个过程的高潮发生在公元2世纪初。这样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佛教在西域出现会如此之晚。公元2世纪，西域农业所发生的质的变化以及人口爆炸式地增长，为城市的出现、商业的发达以及富有的城市贵族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从而具备了建立僧院佛教的条件，终于在公元3世纪中塞林底亚（西域）的佛教真空被打破，留下了米兰

① [荷]许理和：《汉代佛教与西域》，吴虚领译，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2辑，大象出版社，1998，第302页。

② 许理和举《汉书》与《后汉书》西域9个国家做比较：《汉书》载九国人口户数为14311户，一个世纪后，《后汉书》记载人口户数为83123户，增长了580%（注：原文计算有误，应为480%）。其中于阗由3300户增到32000户；焉耆由4000户增到15000户；疏勒由1510户增到21000户，是增长最多的国家。由于《后汉书》没有龟兹的人口户数，故没有增长的具体数字，但《汉书》所记龟兹户数为6970户，为西域人口大国。如按增加5倍算，可高达34850户（注：原文计算有误，应为41820户）。与于阗、焉耆、疏勒等同属西域人口大国之列。